

## 【学术讲演】

### 十八世纪“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中国逐渐衰落的？<sup>1</sup>

葛兆光<sup>1</sup>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本文系葛兆光先生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有补充与修订，原标题为《“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 一、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

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

#### 二、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

<sup>1</sup> <https://mp.weixin.qq.com/s/Q9clns19bDWdtA6wuRhDkA>



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那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那个皇帝五代同堂？有那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象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 三、

首先讲第一点，也就是帝国内部庞大的疆域、族群。

康熙到乾隆，一个最被夸耀的成就是版图扩大，这当然很了不起，因为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回看十八世纪的历史，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罗威廉所谓“盛清”的“盛”，主要就是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写了一本书就是《乾隆帝》，也承认他的这些功绩。

不过，这种庞大帝国很伟大，但也带来麻烦：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无论是远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准格尔汗国，还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贵州苗疆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钱（像平定仅三四万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万两银子，伤亡近十万）。据徐中约说，平常朝廷开支不过三千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战争，大概有个三五百万两盈余，但是一旦大规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开支。怎么办？就得靠征收格外的税，让商人出资，卖官鬻爵。朝廷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远方的战争和驻守的军队，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一亿两千万两银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尾，其实“内囊已经尽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虽然可以理解为和珅贪腐得厉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庆朝，帝国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除了作为主体的满汉蒙之外，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认同，也相当麻烦，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可是，

<sup>1</sup>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各地的动乱此起彼伏，经历了回民、苗民、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帝国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这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显然，大帝国有大帝国的麻烦，所以，后来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后，延续“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虽然相当伟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就相当棘手，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 四、

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

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

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皇帝在思想辩论中的角色。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就像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像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

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越来越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

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可是，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

#### 五、

最后第三点，就是帝国中央权力，皇权也就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

美国学者牟复礼（F. Mote）说过，蒙元、满清都是非汉族政权，他们由于军事上的崛起，习惯于严厉的控制，他们摧毁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对皇权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



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从雍正到乾隆，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字狱，大家记得曾静、岳钟琪和吕留良案吧，臣下该死，圣上英明。所以，许倬云先生说“清代的君主，独擅威权，天下臣民，都是奴隶”，绝不止是满人包衣之类自称“奴才”，而士大夫呢？许倬云也说，“在领导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权独大，国家太强，地方也好，社会也好，士大夫或知识人阶层也好，甚至商业贸易，都受到制约，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税代理人”，顾炎武《郡县论》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根本实现不了。

看一下欧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就像在座的王赓武先生所说，这种宪政制度棒极了，“每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宪法”，这是英国《大宪章》之后，延续洛克政治思想才发展出来的宪政主义，更何况在英国，当时已经是政教分离（参看《王赓武谈世界史》）。而在中国，皇帝就是政治权力、神圣象征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就说中国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皇权或者国家的权力太大，始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1）没有“祖国/国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觉区分，就是王赓武先生说的宪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觉区分，政治权力就无边无际，用皇帝或国家名义为所欲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与权利分配，地方、乡绅、商贾就缺乏积极性，社会力量就形不成，商业贸易就没有制度保障，政治权力和经济行为也不能权责分离。（3）皇帝或者朝廷的权力太大，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就不能分化，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阶层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和监督的力量，“道统”无法制约“政统”，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没有办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为中心的朝贡制度，那时要面子吃亏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发展，当官方体制面对商业市场，也就是想方设法赚钱的自由贸易，差别就很大了。这使得清代中国从盛世之后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来，清流之类的士大夫兴起，各个口岸开放，但为时已晚。甚至直至今日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过去东西方很多学者喜欢讲“江南”，觉得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甚至比英国经济还发达，中国才是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学派就用“江南”和“英国”比较，讲白银资本，讲大分流。虽然他们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认欧洲中心论，是对西方近代的质疑，但是中国作为帝国，江南作为帝国高度控制的一个地区，和一个独立的、拥有殖民地的、现代制度下的新兴帝国，怎么可以比？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帝国国家控制力的强大，对于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对于市场、原料、关税等的国家调配，与英国很不同。你不能简单比较，否则我们要问，为什么江南或者中国没有形成“产业革命”和“现代社会”？

## 六、

关于“漫长的十八世纪”和“盛世背后的危机”，我就讲到这里。最后我想回到世界史中，讲一个小故事：1796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据说他退位是为了向他的祖父，也当了六十年统治者的康熙致敬，所以他选在这个时候退位，但是，他还是把皇位传给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了。恰好同一年呢？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他拒绝了第三次连任，为的是要坚决捍卫民主的总统制度。最近，有人提起这一点就说，在我们有关历史的印象中，华盛顿好像比乾隆皇帝晚得多，好像华盛顿是现代的事情，乾隆皇帝好遥远，其实，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两人同样在1799年，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去世，不是华盛顿近乾隆远，只是从制度上看，确实一个太古代，一个很现代。



也许，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大分流”，也就是十八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中国的衰落。

## 【学术讲演】

### 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sup>1</sup>

——葛兆光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

图像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什么，历史研究又可以为图像做些什么？在中国艺术史领域，我们有很多东西还不能很好地解释，也许我们需要更多努力来探索图像背后的东西，逼迫图像开口说话。

其实，我本人对图像和艺术这方面没有研究，所以，这里我就选择一个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问题，用一些图像，来讨论中国的“外”和“内”。我选的材料取之于各种“职贡图”和各种“蛮夷图”。我想用“职贡图”来看中国之“外”，用“蛮夷图”看中国之“内”。当然我要先说明，在传统帝国时代，这个疆域、族群的“内”与“外”是不断移动的。

大家都知道，图像不说话，但是从古代以来，很多人都说过，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左图右史。郑樵《通志·图谱略》曾经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也就是说，又要看图，又要看书。在《新唐书·杨绾传》里，有这么一句话：“独处一室，左图右史。”可是，长期以来研究历史，基本是看文，看有字的书，那个没字的画，好像不容易直接用来做历史研究。

可是，这个传统在西方早就被打破了。西方人对于图像作为历史、作为研究历史的材料，已经是很长的一个传统了。彼得·伯克（Peter Burke）可能是近年来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历史学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2003年写过一篇文章《作为证据的图像：十七世纪欧洲》（*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里面说，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相当重要，应当把图像视为“遗迹”或“记录”，纳入史料范围来处理。他甚至认为，现在的学界已经有一个“图像学转向”（Visual turn 或 Pictorial turn）了。

关于彼得·伯克说的这些，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书《图像证史》，他会告诉你，怎么让图像说话。

#### 一、

首先，我要讲一段引子——从《职贡图》到《皇清职贡图》，看看古代中国是怎么样描述“天下”、表现“异域”的。

这个“职贡图”用大白话讲，就是“看外国人”。在世界还没有沟通得那样顺畅的情况下，“看外国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一般民众当然是好奇、紧张；知识分子是为了掌握知识、了解世界，所以，后来会发展出人种学、民族志这样的东西。最喜欢看外国人的还有统治者，古代中国非常古老的书籍里就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各国诸侯来朝拜，天子看有这么多匍匐在脚下，为我所笼罩的异邦，心里会很快活。传说里面，大禹在会稽聚会诸侯，其中有一个部落酋长防风氏来晚了，就得被杀掉。天子借此立威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在《逸周书·王会》篇里也讲到四夷来朝，有东夷、南越、闽瓯、西戎义渠、北狄肃慎，各个地方的人来朝拜。但是，据学者研究，形成制度并有实际记载，大概是在汉武帝时代。日本学者榎一雄曾经讲过，

<sup>1</sup> 原刊《文汇学人》 [https://mp.weixin.qq.com/s/nIOubfzYXHNAXWO3tk\\_-Vw](https://mp.weixin.qq.com/s/nIOubfzYXHNAXWO3tk_-Vw)

